

天圆地方——围棋文化散文选

序 言

黑白之道

何云波

—

围棋是一种游戏。

这是一种关于生存竞争的游戏。大凡人类把现实中的各种争斗游戏化,便有了种种体育竞技。而当以游戏为游心之事,为精神之快乐,它便成了艺术。

黑白子,纵横十几道格子,先人们在这里演绎了无数的厮杀、争斗、悲欢离合。同时它也有着玄妙的意境,包含着宇宙之象、人生之道。围奘象天,方局法地,一阴一阳之谓道,围棋,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,犹如气功,犹如阴阳八卦。

围棋不知起源于何时?“尧造围棋,以教子丹朱”,这当然是附会。中国人往往喜欢把一些物品的发明权交到某位圣贤手上,这就像一位穷小子,攀上了富亲家,从此有了显赫的身份。但围棋产生于原始时代,却又是大为可能的。当原始时代的先人们,在地上画三五道方格,摆上几颗石子,或几根长短不一的树枝,做圈地、攻杀的游戏,也许,这便是古老之“弈”的雏形。

围棋本为玩物,后来却被赋予了许多别的意义。中国的儒

士们，一方面慷慨激昂，壮心不已，一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样子；另一方面，又不失人好玩的天性，但玩物往往容易丧志，怎么办？最好的办法便是将这种“玩物”纳入到正统的规范、体系中，赋予它一种正面的意义，以玩得心安理得，名正言顺，不亦乐乎？不亦君子乎？

对围棋实施“招安”战略的始作俑者，便是东汉的大名人班固。这之前，围棋的地位一直不高。尽管孔夫子《论语》中就有教导：“饱食终日，无所用心，难矣哉。不有博弈者乎，为之犹贤乎已。”这仅仅是说，如果无所事事，还不如下棋。亚圣孟子则把“博弈好饮酒，不顾父母之养”列为世俗五不孝之一，似乎围棋的盛行，已冲击到当时社会的伦理秩序。西汉时，围棋被当做“失礼迷风”、“简慢相轻”之物。围棋所具有的平等、竞争意识与儒家仁、礼之道相冲突，决定了围棋的被贬抑。而班固，却大大突出了围棋的正面意义：“局必方正，象地则也。道必正直，神明德也。棋有白黑，阴阳分也。骈罗列布，效天文也。四象既陈，行之在人，盖王政也。成败臧否，为仁由己，危之正也。”文以载道，棋亦载道，本为“技艺”的围棋，拥有了“道”的身份，也就获得了意义，有了存在的依据。

不过，围棋史上也一直不乏反对派。三国时吴地棋风盛行，人们“多不务经术，好玩博弈，废事弃业，忘寝与食，穷日尽明，继以脂烛”。乃至吴太子孙和要命群臣作《博弈论》，据说共获六篇，惟韦曜之作独占鳌头。韦大人也确实了得，引经据典，苦口婆心，循循善诱，义正辞严，拳拳之心天人可鉴。可惜韦大人的努力，终无济于事。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。到魏晋南北朝时，竟迎来了中国围棋的第一个黄金时代。

魏晋时，围棋观念的一大变化，就是确立了围棋作为“戏”的独立存在的价值，并把它纳入到“艺”的范畴。这之前，无论赞成

还是反对，都不脱功利之心。韦曜说，围棋“胜敌无封爵之赏，获地无兼土之实，技非六艺，用非经国，立身者不阶其术，征选者不由其道。而空妨日废业，终无补益”。班固则强调围棋“上有天地之象，次有帝王之治，中有五霸之权，下有战国之事，览其得失，古今略备”。这两种观点，看起来针锋相对，实际上出发点或曰看问题的角度并无分别。

魏晋士人则反其道而行之，“生年不满百，常怀千岁忧。昼短苦夜长，何不秉烛游？为乐当及时，何能待来兹？”他们把足以引起人的精神愉悦的活动都称为“戏”，并确立了“戏”的价值。嵇康有诗曰：“琴棋自乐，远游可珍。含道独往，弃智遗身。寂乎无累，何求与人？长寄灵岳，怡智养神。”寄情于诗酒琴棋山水，成了他们释放自我的一种方式。与此同时，围棋也正式成为一种“艺”，并有了完善的品第制度。诗有《诗品》，画有《画品》，书有《书品》，棋则有《棋品》。沈约《棋品序》称围棋“体希微之趣，含奇正之情；静则合道，动必合变。若夫人神造极之灵，经武纬文之德，故可与和乐等妙，上艺齐工”。

在中国古代，“艺”有“技艺”与“道艺”之分。“道艺”指儒家六艺：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甚至就指六经，拥有显赫的身份。“技艺”则是各类“术”、“技”，如医、卜、算、书画、博弈等，执此业者则为“技艺之徒”。韦曜说围棋“考之于道艺，则非孙氏之门也”，沈约则说它“可与和乐等妙，上艺齐工”，上艺者，道艺也。沈约不仅肯定了围棋是“艺”，同时还强调此“艺”非彼“艺”，用心可谓良苦。到唐代，琴、棋、书、画并称，棋正式成为“四艺”之一。

中国围棋大致包含“技”、“戏”、“艺”、“道”四个方面。“技”即“技艺”，“戏”即“游戏”，“艺”即“艺术”，“道”即棋道，人生、宇宙之道。中国从唐代开始出现职业或半职业的棋手，他们或做宫廷棋待诏，或依托于达官，或在茶楼酒肆陪人下棋，赌彩为生。

但奇怪的是，当某种“艺术”一旦成为职业，操此职业者成为“技艺之徒”，地位便急剧下降。棋史上曾有一传说，南宋棋待诏沈之才一日在宫中与人对弈，宋高宗观棋。见沈之才之棋有危急，谕曰：“切需仔细。”之才对曰：“念兹在兹。”上怒：“技艺之徒，乃敢对朕引经耶？”命内侍省打竹篦逐出。棋待诏乃国手，实际上却不过是充当帝王享乐的工具。“技艺之徒”，竟敢引经据典，那就叫不识天高地厚了。

“技”与“道”，往往成了区分棋品、人品高下的分水岭。正因为如此，当人们想要拔高棋手的品位时，往往便要淡化他们作为棋手职业的一面，而将他们雅化、名士化。瞿世寿《〈不古编〉序》称国手吴瑞徵“视其所操之技，则弈也；察其所藏之蕴，非弈也”。而明末国手过百龄，“以相国之招而不去，以金吾之祸而不避，至知国家之倾覆而急归，为公卿门下客者，垂四十年，而未尝有干请。若百龄者，仅谓之弈人乎哉？”（《过百龄传》）“比德”者尊，“执技”者下，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重道轻技传统。

与此同时，文人们以棋为一种爱好，就像他们好在绢、纸上随意挥洒，笔走龙蛇一样，便成了一种雅尚，一种赏心乐事。棋有文人棋和棋士棋，画有文人画与画师画，两者在品位上竟也分出了高下。只是书、画孰好孰坏，由文人说了算。棋枰对弈，却是立马就要分出高下来的。文人往往技不如人，索性看淡胜负，以“胜固欣然，败亦可喜”、“善弈不如善观”相标榜。钱谦益称“余不能棋而好观棋，又好观国手之棋”。观棋而“语”、为人作序的同时，又作了许多观棋诗。张潮作《棋论》，谓翰墨棋酒，乃人生必需，“春雨宜读书，夏雨宜弈棋，秋雨宜检藏，冬雨宜饮酒。春听鸟声，夏听蝉声，秋听虫声，冬听雪声。白昼听棋声，月下听箫声，山中听松声，水际听乃声，方不虚此生耳”。围棋艺术化，人生审美化，正是中国围棋也是中国文化的动人之处。想想，当

“秋气晴美，天光照席，水波不兴”之时，扁舟一叶，棋枰一局，“江山之胜尽入局中”，该是一种多么令人神往之妙境。

游戏之事，或被当做饭碗，或被当做一种精神的艺术，小小黑白子，也就具有了别样的意义。而无论棋士还是文人，他们都愿意把围棋风雅化、玄妙化，以显示自己所执之“技”或所好之“艺”的不同凡响之处。中国思想文化的源头是《易经》，中国经籍中最玄妙的也是《易经》。于是，将“弈”与“易”并举，甚至强调“弈”本身就是“易”，便成为一种时尚。《兼山堂弈谱·序》称：“弈之为言，易也，小数之乎哉。弈者变易也，自一变以至千万变，有其不变，以通于无所不变。”《弈理指归》称棋乃“按五行而布局，循八卦以分门”。汪缙《弈喻》以棋为“易”、为“天技”。如此种种，几乎成了论棋者不变的“定式”。

不过，当中国围棋被日益艺术化、玄妙化，日益成为一种“雅玩”时，它作为竞技的一面又被大大弱化了。

竞技得以真正实现的前提是人的自由与平等，中国封建等级专制社会，恰恰缺乏平等竞争的机制。中国古代围棋基本上是一种“玩物”，处在自生自灭状态，从未建立过完备的竞赛体制。而在文化观念上，中国文化重“和”忌“争”，作为争胜之道的围棋，或被当做“害、诈、争、伪”之物被贬抑，或被纳入到“仁”、“礼”、“和”的轨道中。“彼简易而得之，宽裕而陈之，安徐而应之，舒缓而胜之”（《弈棋序》），被认为是棋的取胜之道的最高境界。即便要赢，最好“赢止半子”，赢多者，嗜杀者也，非君子也（《弈喻》）。而事实上，中国古棋大多嗜杀，棋盘上硝烟弥漫，纸上谈兵时又如此的温文尔雅，理论与实践的脱节，成了中国古代围棋的一种有趣现象。

中国围棋，在清中叶以范西屏、施定庵“双子星座”的出现为标志，达到顶峰，此后，则开始江河日下。

这固然是随着国运衰棋运亦衰,另一方面,也有文化土壤、围棋观念上的原因。二十世纪,在中国文化转型的大背景下,中国围棋也开始了它的蜕变。

二

当围棋在它的故乡日趋没落时,与中国一衣带水的一个岛国,吸收了中国围棋后,又将它发扬光大。于是,古老的围棋,拥有了第二故乡,重新焕发出生命之光。

这个岛国就是日本。

一九〇九年,日本一个普通的四段棋手高部道平到中国来,横扫中国棋坛,中国所有名手都被打到让二至三子。中国棋界震惊了。山中才七日,世上已千年,中国棋界的闭关自守从此被打破。

日本围棋对中国围棋的改造,就是首先让围棋回归到它的本来状态:竞技,并建立了完备的竞争机制。金克木先生说:“日本棋士是专业,着重争斗、胜负。中国人下棋多是作为业余,含有表演意味,日本棋士是战士。中国棋士是艺人。”让一个提着刀的武士与一个拿着折扇的艺人同场较技,结果可想而知。其次,它敢于打破中国古棋的种种陈规,比如座子制,棋盘上顿时有了更广阔的供你自由挥洒的天地。

竞技之道与艺道、宗教之道的高度融合,所谓菊与刀,造就了日本棋道。中国围棋的转型,就是在日本围棋这种外力的推动下开始的。一种文化的转型,注定要在与他种文化的交汇中获得契机与动力。

一个伟大的棋手,也正是在这文化的交汇点上,横空出世了。他——便是一代大师吴清源。

吴清源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的棋手，一个胜负师，更是围棋文化的巨匠和以棋发言的思想家、悟道者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吴清源才会受到棋界内外如此众多的关注。

郑也夫在《围棋·文化·边际人》一文中将吴清源称做一个“文化的边际人”。其实，二十世纪不少有成就的棋士都曾脚踏两种文化：韩国的赵南哲、曹薰铉、赵治勋、柳时熏、赵善津，作为炎黄子孙的顾水如、林海峰、王立诚、王铭琬他们都曾在围棋最发达的日本修业，其后或回到自己的祖国传播围棋的火种，或留在日本拼搏，取得杰出成就。当然，吴清源是其中最耀眼、最具代表性的一个。

吴清源是个文化的漫游者，他曾自称是个“国际游民”。生长在动乱的旧中国，其后又长期客居他乡，在战乱和颠沛流离中，历尽生活的艰辛。但另一方面，游弋于中日文化之间，又使他得以吸收中国与日本围棋文化的养分，兼收并蓄，最终成就他在棋盘上的伟业，人生中的大修为。同时，当日本围棋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又日益“程式化”、“僵化”时，吴清源作为一个文化的边缘人，他在吸取了“主流文化”（或曰“中心文化”）的长处时，又保持了来自边缘的客观性、超越性、批判性。这两者的融合，往往能造就一种“特异”的气质与才干。也正因为这种在“中心”与“边缘”之间游弋所造就的特异禀赋，才有了吴清源对主流传统的批判，在棋盘上的自由挥洒，不断创造。

如果说两种文化的汇通为吴清源的棋艺提供了多种养分，信仰则成了他的精神支柱。吴先生认为，他的一生都是在胜负与信仰中两路兼行，一方面作为棋士，在残酷的胜负世界中奉行武道；另一方面，将红教思想和东方哲学思想，当做人生的指南而自我陶醉于丰富的精神世界里。胜负与信仰，如同人离不开水与火一样，缺一不可。

围棋固然是艺术，但又是一个赤裸裸的胜负世界，胜者为王败者寇，容不得任何的洒脱与浪漫。而像吴清源这类“外来者”，要融入到主流社会，被主流所接纳，就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艰辛。在残酷的胜负世界里，他们是被逼到悬崖上的斗士，没有任何的退路，只有勇往直前，争取胜利。所以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，他们在绝境中所焕发的斗志，人的全部潜能，也是惊人的。从一九三九年的“镰仓十番棋”开始，到一九五五年与高川本因坊的大战，吴清源在十番胜负的舞台上坐播十回，对手包括当时所有的最强者，他将这些对手几乎全部打入先相先以至长先的境地，由此得了个称号：“十番棋的吴清源”。但吴清源事后却无限感慨：“十番棋”这种争斗形式，真是太残酷了，它就像悬崖上的白刃格斗，若不是身临其境地去尝试一下，断然体会不出那种恐怖的滋味。读读吴先生回忆录中的其中一节《镰仓十番棋》，读者定会深有同感。

吴清源在十番棋擂台上的胜利，表面上看起来风光八面，但他为此的付出，他所承受的压力，恐怕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吴曾把擂台叫做“用棋士生命作赌注的十番棋”。作为“外来者”，一旦被赶下擂台，就可能意味着棋士生命的结束。面对这种巨大的压力，有的可能因无法承受而脆败，吴清源却始终临危不惧，镇定自若，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。为何能如此？吴清源先生曾总结道：“我认为：我能超越民族和国境的界限，能保持镇静，临危不乱地奋战到底，这全都归结于我的信仰。”

为了追求信仰，吴先生也曾走过弯路，但他始终无怨无悔。在他看来，人的一世就是修行一世，无论是赢，还是输。

纵观吴清源的一生，既是作为大棋士在胜负世界里拼争的一生，也是作为宗教家修行悟道的一生。一为入世道、武道，一为出世道、信仰道，这看似矛盾的两个方面，在他身上如此完美

地统一在一起，使他仿佛成了一尊“胜负里的慈佛”。金庸先生在《崇高的人生境界》一文中称其为“大宗师”：

佛家禅宗教人修为当持“平常心”。吴先生在弈艺中也教人持“平常心”。到了这境界，弈棋非但不是小道，而是心灵修为的大道了。吴先生爱读“易经”、“中庸”，在宗教上信奉各教殊途同归的红教。他的弈艺，有哲学思想和悟道作背景，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师，而不仅仅是二十年中无敌于天下的大高手。大高手时见，大宗师却千百年而不得一。

师兄桥本宇太郎称其为“昭和棋圣”，又像“禅房里修行多年的高僧”。

世有“棋圣”，也不乏“高僧”，然而能将这两者合二为一的，则吴清源一人而已。信仰，为他提供了精神的动力、人生的支撑。因为信仰，使吴清源在残酷的胜负世界里反而有了一份平常心，一份超出于常人的大无畏的勇气。他摈弃了胜负之念，反而使他成了可怕的胜负师。吴清源的手下败将藤泽库之助曾心悦诚服地指出：“吴氏棋艺已达‘真剑化’，实已与围棋混为一体。”这是剑道、棋道，同时也是一种宗教的境界。

川端康成在小说《名人》中认为，日本的武道、艺道同宗教的教义都是息息相通的，围棋是最好的象征。“胜负里的慈佛”，大概就是棋道与宗教相通后的一种境界吧！吴清源是少数达到了这种境界的人之一。他一生孜孜于棋道与人生之道的探索，两路兼行，都颇有所获，最后将两者高度统一在一起，获得棋道之真谛与人生的大解悟。丰子恺在追忆弘一法师的一篇文章中曾说：“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艺术的精神，正是宗教的。”宗教作为一种精神，归根结底，乃是对人生究竟的追问及其精神的

超越,是人类的一种自我拯救及对人的终极价值的寻求。当吴清源不断向围棋与人生的顶峰攀登,是否也超越了常人肉眼的视线,看到了许多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呢?对于吴清源的信仰,俗人恐怕就难用恋世和厌世、积极和消极来置一褒贬之辞了。

“经一生的磨炼,在棋中悟‘道’,在宗教中达‘理’,修成文武双全、人格和谐,性灵与日月同光,”——先生在其自传《天外有天》中的最后一句话,似乎成了其人生的写照。吴清源认为:围棋的最高境界不是冲突,而是和谐。吴清源一生都游弋于两种文化(中日文化)、两种人生(胜负与信仰)之间,一生都在各种冲突中寻找和谐。当他在与自我、与他人、与自然的关系中达到了心灵的和谐,他同时也就在棋盘内实现了理想的和谐之境。和谐,乃是中国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境界。对吴清源来说,和谐,就是他的宗教,这是一种棋的艺术,精神的艺术,人生的艺术。

三

笔者在贵阳围棋文化节上,第一次见到吴清源先生。在开幕式的开棋仪式上,他将第一手棋放在了棋盘正北中间的那个星位上,据说乃是源于易卦的“天一生水”。在《五环夜话》的录制现场,听他侃侃而谈。快近九十的老人,一进入围棋世界,就变得生气勃勃。两个多小时,毫无倦意,谈棋道,谈人生,谈二十一世纪围棋,似乎他的整个身心,也与围棋融为一体了。这时,我明白了,胜负早已成为过眼烟云,而吴先生身上的另外一些东西,却是更值得人细加回味的。

郑也夫在《功利·游戏·求道》一文中,将人生分为功利人生、游戏人生、求道人生三个层面。功利是为了满足人的种种欲望,游戏则更看中精神的快乐,求道则是“一种穷根问底的人生,

一种为生活寻找根据的人生，一种努力把渺小的自我融入博大的关怀中的人生”。人类的一切活动对当事者来说，都可能成为游戏，只要他沉醉于活动本身，淡漠于其结果导致的收益。同样，人类的一切地道的游戏，也可能会成为当事者的“工作”，只要他是完全为了求功利求报偿而投入其中的。吴清源先生无疑是一位纯正的游戏大师，因为他最完整地保持了作为一名棋手的本色，最执著棋艺，淡泊身外之物。过于功利容易使人患得患失，而游戏因为放弃了游戏效益及游戏之外因素的考虑，不为“盘外”形势所动，对棋道更趋于执著，又最有可能接近棋与人生之大道。

可惜，当今社会，却是过于功利主义的社会。围棋这种游戏早已被当做“饭碗”，原也是大势所趋，无可厚非。但是，当人们完全是为了“求功利求报偿而投入其中”时，就不能不令人沮丧了。二十世纪的中国围棋，日益走上竞技化的道路，它使中国围棋在技术层面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。但无庸讳言，现代围棋，也在日益失去许多东西。当人们为沉重的胜负压得喘不过气来，围棋的思想、围棋的美、围棋的艺术、围棋的快乐，却在日益丧失。李洁非在《意在棋先》中，对此有痛切的感受：“围棋到了现代，愈益制度化、商业化、锦标化、国际化，它的竞技强度和水平确实都大大提高了，但与此同时，棋手和围棋本身的天真、个性、自由本质却明显受到严重的挤压。金钱、名誉、地位甚至政治，都在对围棋发出各种诱惑与支配，使棋手心灵意识愈益不天真，不自由，甚而与围棋的本质愈益疏隔。长此以往，吾恐围棋将被釜底抽薪，从深富哲学、艺术底蕴的伟大的人文体系降低为一种雕虫小技般的空心之物。这应该说是在现代性笼罩之下围棋面临的一大挑战。”

围棋是竞技，也是艺术。在激烈的胜负之争中，它还应该包

含着艺术的创造。不少棋手，为名次、头衔、奖金计，太务实，太功利，太“形器”，围棋，也就日益失去了一种魅力。也许正因为如此，李洁非这位文人兼棋迷，看到在第三届农心杯三国擂台赛上罗洗河执白对崔哲瀚的那盘棋，罗本可平稳取胜，却突发奇想，毅然放弃不菲之角地，作屠龙之豪举。目睹这戏剧性一幕，作者竟感到一种“巨大的震撼”。在他看来，与战战兢兢以求一胜的棋手相比，罗洗河此役显然在追求一种他认为更重要的东西：一种跨越得失荣辱的棋盘上的唯美主义，一种对围棋内在的纯净的游戏意识的还原，一种直面本心的享受围棋的快乐主义精神。

一个普通的棋迷，会为也许在罗洗河看来当然的一手而感动，也会为一个棋手普普通通的关于围棋境界的感悟而欣喜：“抛开了简单的胜负，我的棋盘一定会变得很大，那样，我眼中的世界也将是很大很大。”（黄弈中语）也许是因为，这普通的一切，恰恰又是我们所缺乏的。当一个棋手一心只盯着胜负的世界，而在学识、修养、人生境界方面不能获得相应的提高，那他有可能成为大高手，却绝对无法成为一代宗师。围棋国手，作为一种智慧的创造者，也就比一般的明星有了更多的文化担承。棋手如何保持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精神品格也就成了一个问題。多了些名利，少了些不凡的学养、宽广的胸怀、崇高的人生境界，当然也就没有了如吴清源一般的思想者、文化大师，也就无法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伟大、崇高的使命。

也许，我们有理由对中国围棋新生代代表的棋手常昊寄予某种期望。以常昊的资质、棋力，他登上世界棋坛顶峰应是迟早的事。他一次次的功亏一篑，恐怕非技不如人，而是被杂念所累。再加一番修悟，他一定会登临绝顶的。只是我们的期望不仅于此。中国围棋需要冲锋陷阵的战士，需要胜负的王者，但更

需要大师,需要精神的领袖,而后者,是需要机遇,需要先天的禀赋和一生的修炼的。

四

在中国古代,某种艺术一成为职业,执此业者便成“匠人”、“技艺之徒”。而今,在职业化、商业化的时代,注定了文体明星成了大众的宠儿、偶像,由他们负担起“为国争光”的重任,引领着时代的风尚,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,都牵动着亿万人的心。而众多的棋迷,所谓业余爱好者,他们只能充当陪衬人、捧场者、吆喝者。如要写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围棋史,他们往往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。

然而,正是这些棋迷,他们又是真正纯正的游戏者。做各种“迷”,无论书迷、乐迷,还是球迷、棋迷,大凡都是亏本的买卖,“胜敌无封爵之赏,获地无兼土之实”,但仍旧沉迷其中,乐而忘返,“忘寝与食”,他们惟一所求的,便是一份精神的快乐。他们可以在工余,在田间,甚至在围棋被当做封、资、修禁止的时代,在极端困苦的日子里,“一枰忘万事”,空虚的心灵有了寄托,枯燥平淡的生活有了一丝色彩。他们的水平可以不高,棋具可以非常简陋,用纸画的棋盘,用泥巴、石子、纽扣、马赛克做的棋子,对弈之地可以在地上,在公园石凳、长椅,在床头,这一切都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兴致。围棋的魅力,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展示。

古人曾把围棋比做“木野狐”,这真是一个绝妙的比喻。狐者,美女妖妇也,“忽然一笑千万态,见者十人八九迷”(白居易《古冢狐》)。这黑白世界的精灵,永远有着挡不住的魅力,诱惑着你,走近她,与她相厮相守,而无须任何的理由。“如果你定要

爱我，请别问为了什么，只请你为了爱情而爱我，”这是一度瘫痪的勃郎宁夫人写给她所爱的人的诗。而棋迷，对围棋的爱，大约也是如此。因为爱，而有所感，有所悟，于是有了一篇篇让人心动的文字。

王华的《黑白》写一个村庄，从祖辈开始，一代一代倾心于一种叫“黑白”的游戏。作为外来者的“我”问，为何把围棋称做“黑白”。一位种田状元答曰：“俺这儿的人常说，天上的云是白的，地下的泥是黑的，所以这黑白才变化无穷，没有止境啊。”天上的云，地上的泥，“黑白”也就拥有了一股清香的泥土气息，一种素朴之美。

确实，围棋是什么？每个人心目中，也许都有自己的答案。正像《感悟围棋》中所说：在不谙世事的孩子眼里，围棋是“一群乌鸦与一群喜鹊在林中自由地飞翔”；饱经风霜的老人则把围棋当做“一部承载往事的书籍，白纸黑字，历历在目”；浪漫的诗人说，围棋“一半是海水，一半是蓝天”；恋爱中的男女回答又有不同：“黑白子是一对相亲相知的生死恋人。”在这里，“黑白”就是生命的感悟，就是一种人生。

而当好棋的文人们也纷纷坐而论道时，围棋又具有了一种更深厚的文化内涵。“天圆地方，人居其间。”金克木先生从中国哲学与艺术的角度纵论围棋之道，在老人的心目中，棋乃思想、文化、技术的总和，棋之道，有时往往处在“语言意识之外”，如同佛禅，需要你去慢慢领悟。书法家、易学研究家章秋农先生自称不懂棋，却在《周易》、筷子、围棋、烹调、书法中找到了围棋与中国文化的内在相通处。王干、陆建德谈围棋、巴尔特、对话、阅读，围棋作为“手谈”被当做一种对话的艺术，棋谱成了一种“可读”乃至“可写”的文本。于是，围棋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，与西方当代结构主义大师，又遥相对话，彼亦一是非，此亦一是非，无

可无不可,是棋也,非棋也? 围棋,也就在这种是是非非中变得丰富。

职业棋手、文化人、普通棋迷,他们似乎都是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读解围棋。写过《黑白之道》、《境界——关于围棋文化的思考》等著作的胡廷楣先生,有一次曾跟我谈到,有职业棋手看过章秋农先生谈围棋的文章,认为他根本不懂棋。而反过来,一些文化人也常感叹,一些职业棋手下了一辈子棋,却并不一定能悟得围棋之道。也许,他们心目中的围棋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东西,有竞技之棋,有文化、艺术之棋,立场、视角的差异,往往造成了两者的隔膜,无法实现真正的沟通、对话。不识庐山真面目,只缘身在此山中。其实,正是棋内棋外之人,从各自角度对围棋的阅读,围棋才可能变得完整,走向深刻。

这本《围棋文化散文选》,便仿佛是为古往今来各路英雄,提供一个纵论围棋之道的舞台。这里有古人论弈道,说弈事,有二十世纪的各类棋人棋事,有各色人等对围棋的感悟。有对话,有独白,众声喧哗,围棋也就有了万千的气象,丰富的色彩。令人奇怪的是,古代各类棋谱中尚收一些棋论文字,当今围棋技术的书籍层出不穷,却少有人肯在古老的围棋文化园地里驻足片刻。中国围棋文化源远流长,这册荟萃围棋文化散文的小书,一不小心,竟博得个头彩,令人感慨。围棋当然是供人下的,以胜负为要,但茶余饭后,在案边,在床头,翻开这本小书,一路行来,也许你时时会有所发现,有所会心;原来围棋也是可以这样去“读”的。

何云波

2002年2月23日于中南大学潇湘听弈庐

第一辑

弈 旨

西汉·班固

[题解]

班固(32—92),东汉著名史学家。字孟坚,扶风安陵(今陕西咸阳)人。明帝时任兰台令史、典校秘书。著名史学家,撰有《汉书》。

《弈旨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系统阐述围棋理论的文章。班固将围棋与天文、阴阳、王政、仁德联系在一起,突出围棋作为游戏之外的意义,首开了儒家从正面的角度论棋的先河。

大冠言博既终,或进而问之曰:“孔子称有博弈,今博行于世,而弈独绝。博义既弘,弈义不述,问之论家,师不能说,其声可闻乎?”曰:“学不广博,无以应客。北方之人,谓棋为弈。弘而说之,举其大略,厥义深矣。”

“局必方正,象地则也。道必正直,神明德也。棋有白黑,阴阳分也。骈罗列布,效天文也。四象既陈,行之在人,盖王政也。成败臧否,为仁由己,危之正也。”

“夫博悬于投,不专在行。优者有不遇,劣者有饶,拿相凌,气势力争,虽有雄雌,未足以为平也。”